

“故意伤害罪”让你进京自首也是白搭

童貽鴻的進京自首讓權力的“自尊心”受到了極大傷害,權力發怒了,後果真的很嚴重。

■郭文斌

12月5日,进京自首的童貽鴻被武汉洪山区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。因用砖头掷伤“拆迁人员”,童貽鴻涉嫌的罪名由刑拘时的寻衅滋事变更为故意伤害。警方拒绝透露任何消息(12月7日《新京报》)。

遭遇强拆恐怕是现实中最不幸的事。你想保卫自己的家园,凭你自己的力量,太单薄了。拿什么与其抗争?自焚太极端,一般情况下,你也只能扔扔砖头。但对不起,如果一不小心砖头砸到了人家,那警方就可以给你安一个罪名。如果他们觉得罪名轻了,就换一个。现在,悲剧的主角就是童貽鴻,他的罪名从“寻衅滋事罪”变更成了“故意伤害罪”,一旦定罪,刑罚也会明显加重。

想想真是悲哀。童貽鴻一开始就是因为对当地警方不信任,才平生第一次坐飞机,去北京自首,没想到,结局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惨。直到现在,童貽鴻都不知道那块砖头砸到谁了,反正听说是重伤。可见,砸伤谁不重要,重

要的是,凭这个可以定你的罪,于是结局就变成了恐怖片。

进京自首,引发舆论关注,至少当地警方应该表示出诚意,应该用事实说话,应该拿出证据向公众交待清楚。可当地警方却不管这些,对于他们来说,唯有听从权力的“命令”才是正道,至于媒体的声音,只能当作知了在叫,充耳不闻罢了。

权力的威严向来是侵犯不得的。这不,童貽鴻的进京自首让权力的“自尊心”受到了极大伤害,如果不将童貽鴻往死里整,以后说不定会有更多的人要进京自首,这还了得。对不起,童貽鴻,你的权利只能一退再退了。即便是你一再表明自己家不是“钉子户”,即便同意按拆迁方此前提出的“拆一还一”方案拆迁,也没有人和你们家谈了。权力发怒了,后果真的很严重。

现在看起来,进京自首是没有用的,连进京上访都没用,何况是自首?早晚还得回家乡去。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,当警方也听命于权力时,套在童貽鴻头上的罪名只会越来越重,就像那个“蛋形蜗居”,媒体一关注,就滚“蛋”。悲哉!



进京自首也逃不掉

配图:张兮兮

局长酒驾肇事又是政府买单

政府善後不是大包大攬。否則,豈不是在告訴公眾,官員酒駕肇事也是一種公務行爲、政府行爲?

■舒心萍

12月7日上午,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通报了“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阳酒后驾车致5人死亡”的特大交通事故进展,谷青阳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。记者7日晚从死者家属处获悉,每位死者将得到23万元的赔偿,目前5名死者的家属都已在赔偿协议上签字(12月8日《新京报》)。

从事发到死者家属获赔,期间仅用了2天时间,如此高效率的善后,应该说还是很值得称道的。不过,笔

者在此有个疑问,每位死者的23万元赔偿金究竟该由谁来买单,是政府还是保险公司,抑或是谷青阳本人?

据报道,记者从死者杨园美的父亲处得知,死者亲属都已经与政府签订了赔偿协议。而村民杨春朋说,儿子杨少朋是独子,他曾经提过赔偿金50万,但政府表示按照法律规定,赔偿金只有十几万,乡里自己补贴后才达到23万,不可能给更高的数额。看来,这笔赔偿金,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当地政府出的。

当地发生这么大的交通事故,政府积极善后,抚慰死者家属,稳定死者家属情绪,这是应该的,也是必须

的。但是,政府善后不是大包大攬。谷青阳酒驾完全属于个人行为,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行为,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理应由他自己承担,赔偿金怎能由政府来出!如此,岂不是在告诉公众,官员酒驾肇事也是一种公务行为、政府行为?

笔者以为,这笔赔偿金最多只能由政府先垫支,之后,哪怕让这位官员倾家荡产也应全额追偿,以此分清政府与官员的责任。同时也让各级官员长个记性,酒后驾车肇事,一切后果自负。如此,才是最公正、最有效的善后。否则,就是在制造更多的不公平。

会议费“返现”,双方梦里笑出声来

等到會議費“返現”蔚然成風,才驚覺問題的嚴重性,而反思的指向竟然是對付賓館之類的商業機構,那些想打公款主意的人,恐怕夢裏都會笑出聲來。

■李辉

“返现”,原意是购物达到一定金额后按照一定的比例返还现金,本来是商场的一种促销手段。但是,记者近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,“返现”被某些单位用在了会议费上。一些公司、宾馆按照客户要求,将会议费的部分或全部金额在扣除税费之后返还(12月7日《检察日报》)。

新闻给出的数据触目惊心——仅在北京的一家宾馆,自2003年以来,接受会议费“返现”的单位就达上百家,有的单位的“返现”金额已超过百万元。会议做幌子,商家来迎合,双方的暗中交媾大肆侵吞着公款。管理的失范,商家的失德,织就了这疯狂

的腐败温床。

新闻中,税务、工商、审计等部门都强调受法规所限,自己对相关商业机构没辙;检察官则建议,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应尽快对“返现”现象进行调研,并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制定处罚规定。可我不得不感叹,监管、治理怎么这么“一根筋”——干吗傻乎乎地只盯着商业机构,而不从公款管理的源头入手?

前提放得太宽,细节不加思量,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似乎已成为管理公款的一贯作风。就拿会议费来说,监督管理机构先是认可了会议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,由此就对会议费进行粗放管理,对会议费之下的猫腻严重失察。试想,一个单位光“返现”的会议费都能达到数十万元乃至百万元

以上,那么这个单位究竟要开支多少所谓的会议费,符合常理吗?如果监管部门连这点敏感都没有,迎来耳光响亮的羞辱就是必然的事情。

一个单位确实需要开会,但是,开会为何要到宾馆,为何要花那么多钱?等到去宾馆开会四处泛滥,等到会议费“返现”蔚然成风,才惊觉问题的严重性,而反思的指向竟然是对付宾馆之类的商业机构,那些想打公款主意的人,恐怕梦里都会笑出声来。

事实上,对公款管理的松弛,岂止会议费“返现”的暗渡陈仓?旅游叫考察,吃喝叫接待,分钱叫关怀,甚至一辆汽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……公款已成为一些人想拿就拿的聚宝盆,管理者总该脸红心愧了吧。

反就业歧视 关键在法律给力

下一道通知,出幾條規定,讓用人單位從招聘條款中刪去歧視的字眼或許並不難,難的是如何讓公平就業理念成爲社會共識。

■叶祝颐

又到一年求职高峰期。来自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,2011年全国将有6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,比今年增加约30万,就业压力依然很大。户口、外貌、酒量,这些并非始于今年的就业“潜规则”浮出水面,堂而皇之地进入公众视野。有的单位招聘,酒量、斟酒动作、舞姿、仪态举止及是否豪车都列入考察范围;在一些地方,连生肖、姓名也成了招聘条件(12月7日《工人日报》)。

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,政府本该担当起引导和监管责任,带头促进求职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。然而,今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布的“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调查报告”显示,国企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就业歧视很严重。这势必给其他用人单位传递出“歧视有理”的错误信号。

与此同时,调查显示,45.10%受访大学毕业生认为目前就业歧视现象无法避免,30.02%受访大学生认为虽然可以避免,但却没人管。而遭到就业歧视后,67.03%的受访者选择无奈接受。有人说,求职者对就业歧视的心态如此“集体无意识”,令人纠结与失望。但在供过于求、就业难的大背景下,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权利地位普遍不对称。求职者根本没有话语权,对“隐性就业歧视壁垒”,他们并非“无意识”,而是无可奈何。

笔者注意到,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清理就业歧视条款。政府有关部门下一道通知,出几条规定,或者让用人单位从招聘条款中删去歧视的字眼或许并不难,难的是如何让公平就业理念成为社会共识。在当前就业环境下,指望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单打独斗,凭几名专家、学者呼吁反就业歧视,凭媒体不断曝光就业歧视,作用十分有限。因为,公平就业的法律精神并没有被用人单位信仰。

对此,一方面,政府要带头清理、矫正自身用人歧视条款,营造公平就业的气氛,保护公民平等参与就业竞争的权利。另一方面,既然有了法律与制度,就要千方百计让它真的生效,而制度的效力来自于强大的执行力。一旦法律、制度生效,职能部门就要升帐理事,既要主动出击,到一线查处歧视求职者的用人单位,又要认真受理举报,谁违反制度谁受罚。让用人单位出于违法成本考虑,不敢乱设就业歧视门槛。唯有如此,法制建设才有意义。

一言以蔽之,政府带头打破就业歧视,法律对反就业歧视给力,反就业歧视才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。